

新亚种蛾：罗伊对印度现代性的探索

黄 怡 婷

内容提要 “新亚种蛾”是印度作家阿兰达蒂·罗伊《微物之神》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它是伊培家的祖父帕帕奇在印度独立后发现的一个蛾类新亚种。新亚种蛾的消失，蕴藏了罗伊对印度本土文化与殖民异质文化正常融合的理想期待，体现了罗伊本人对印度现代性的探索。

关键词 罗伊 新亚种蛾 融合 现代性

在当代获得国际重大文学奖项的印度或印度裔作家中，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是唯一一个印度本土出身并始终坚持在印度生活的作家。^① 她的写作与其他拥有海外旅居经历的印度或印裔作家不同，不仅关注印度当下，更希望能以此参与印度未来。综观罗伊的所有著作，除了成名作《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以小说形式写成，其后作品大都是政论文，直接关涉印度社会具体事件或人群。这些文章体现出的她对印度社会关注之深、参与度之高，足见她与这个国家有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亲密。回溯以往国内外对罗伊作品的解读，多从“后殖民”理论或印度“庶民理论”出发，着重于罗伊对印度社会现状的批判，强调帝国殖民势力和印度传统文化力量对印度社会发展的禁锢或制约，忽略了罗伊作为一个关心印度的本土作家，其批判意图绝不仅仅是如前辈“流散”作家奈保尔或拉什迪那般，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以一种客观、疏离的第三方态度写出这个国家的满目疮痍，她的重心更在于借批判来表达现代印

^① 罗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明确表示：“要我不在这里〔印度〕会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包含了所有我所爱的。”（Shoma Chaudhury, “Ten Years On...”, in *The Shape of the Beast: Conversations with Arundhati Roy*, London: Hamish Hamilton, 2010, pp. 242–243）

度的未来应该是怎样的。事实上,罗伊对印度的这种关切是一以贯之的,不单是她的政论文,在她的小说《微物之神》中亦有显著展现。在该小说中,“新亚种蛾”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意象,总在小说关键之处出现,对整部小说起着起承转合的重要作用,也蕴藏着作家罗伊对印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索。

一、帕帕奇的蛾

在小说《微物之神》中,“新亚种蛾”是伊培家族的祖父帕帕奇在退休后发现的一个蛾类新亚种,而且发现的时间节点极为特殊,正是印度刚取得独立不久。一只印度本土蛾原本是印度自然生态体系的一分子,在印度这块广袤而悠久的大地上,不知生活了几千年,被帕帕奇发现后,却不得不被纳入西方现代生物分类学的考量体系,成为帕帕奇眼中一个蛾类新亚种的代表。通过这一情节设置,罗伊隐喻印度这个有着数千年古老宗教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在独立后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得不进入西方先发现代性的既定框架中。

“现代性”这一概念肇始于17至18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对“过去”和“当代”的区分^①,“是欧洲启蒙学者有关未来社会的一套哲理设计”^②,“在伏尔泰、卢梭那里,现代性是一项社会设计,它精致和谐,充满自由、平等、博爱的光辉……在黑格尔头脑中,现代首先是一个决心与传统断裂的概念……现代又是一个充满运动变化的概念,它串联起一组新话语,如革命、解放、进步与发展”^③。在启蒙学者掀起的这波关于现代性的“第一、第二浪潮”中,产生了如“自由民主制”这样具体的现代社会建设的构思。^④这些思想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在全球的殖民扩张和统治秩序的确立,也逐渐传播到了它们的殖民地。印度作为老牌殖民帝国英国的殖民地,其上层精英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些思想,“开始用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观点来观察印度”^⑤。之后,经过19世纪数轮以宗教为切入点的社会改革(如梵社、祈祷社、圣社等的出现和兴起),印度社会改革家们努力将西方现代文明的理念引入本土文化中,逐渐让前者自上而下地在印度社会

① 详见杰拉德·德兰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知识,权力与自我》,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2页。

② 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第641页。

③ 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647页。

④ 详见利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丁耘译,收入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上),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5页。

⑤ 详见刘建、朱明忠、葛维钧《印度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77页。

中传播开来，推行“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为印度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的共识。^①到了20世纪初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印度的逐渐确立，这些现代理念得到了民众更为广泛的接受，国大党能够崛起并成为印度政坛的中坚力量就是一例明证。及至印度建国，“民主制、联邦制、世俗主义原则^②正式写入宪法”^③。从此，上述三原则成为印度全民上下共同奋斗的目标。然而，与印度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相比，跟随殖民统治而来的现代性思想在这个国家毕竟属于外来的新兴事物，印度的现代建设道路也迥异于孕育了这些现代思想的西方国家。印度著名学者查特吉就曾明确指出：“我们在一味模仿[西方国家]的过程中，有些东西是不适应的。”^④罗伊本人也曾在驳斥有人认为她持“反对发展论”时强调：“我所谈论的不是发展。我所谈论的是发展的策略……是更多的发展……更多的民主……更多的现代化……”^⑤显然，罗伊并不排斥现代性，但她也同时明确指出，这其中存在着策略问题。在《微物之神》中的新亚种蛾这一意象上，便体现出罗伊本人指出的发展策略问题以及查特吉所描述的那种积极主动而又夹杂着“不适应”的模仿。

帕帕奇精心制作了蛾的标本，在发现它的第二天就“搭头班列车返回德里，为的是引起分类学界的关注和他所希望的名声”^⑥，以使自己“帝国生物学家”(God: 48)的身份名副其实。然而，他的努力失败了。之后，帕帕奇满心抑郁，直接造成整个家庭“亲英”与“回归印度本土文化”皆不可得，也间接地促成了他的一双儿女恰克和阿慕在这二者间来回挣扎的人生悲剧。对此，学者黄芝认为，“帕帕奇在独立后对荣誉的追求实际上是对昔日殖民统治时期无法企及的名利的追求”^⑦。笔者认为，帕帕奇的努力追求固然是想对昔日无法企及的荣誉有所弥补，但更是帕帕奇作为印度社会精英阶层一员对印度独立之后的一种新期待，

① 详见 R. C. 马宗达、H. C. 赖乔杜里、卡利金卡尔·达塔《高级印度史》，张澎霖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55页。

② 根据王红生教授在《论印度的民主》中的论述，“世俗主义指印度坚持将政治与宗教相分离，在尊重人民的宗教信仰的同时，防止印度成为神权国家”，这是因为“像尼赫鲁这样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受到了正流行于西方的社会平等和经济发展思想的吸引，认识到自由印度只有在宽容和世俗主义的基础上才能生存并重建统一”（王红生《论印度的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9页）。这与上文所提到的“自由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③ 王红生《论印度的民主》，第83-84页。

④ 帕沙·查特吉《我们的现代性》，杜柯柯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5页。

⑤ David Barsamian, “The Coloniza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Shape of the Beast: Conversations with Arundhati Roy*, p. 46.

⑥ Arundhati Roy,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9, p. 49.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⑦ 黄芝《〈卑微的神灵〉中的“想象的终结”论》，载《国外文学》2012年第3期，第150页。

即印度高种姓上层社会能与殖民异质文化实现融合。更为重要的是,这其中体现了罗伊本人的“发展策略”思考,即既具有数千年古老文化传统、又有百年殖民统治历史的印度,是否可以完全顺着西方先发现代性的既定轨道向前发展?

带着深刻的殖民烙印步入新时代的印度,所有事物都天然地同时具有前帝国殖民统治文化和新兴民族本土文化两种背景。这只蛾从山林中不知名的小生命变成帕帕奇案头精致的标本,实际上代表了帕帕奇这位跨越殖民与独立两个时代的生物学家试图融合印度本土文化与统治印度百年的帝国殖民文化的努力。不论帕帕奇自身是否有此意识,他的这一举动都体现了承认两种文化共同存在的兼容并包的精神。查特吉在讨论印度的现代性时也表示:“我们现代化的历史与殖民的历史紧密交缠在一起。”^①然而,英国人在印度的一切殖民活动从一开始只意在帮助英国更好地统治印度,从印度获取最大利益;英国人带来的西方文明主要是为了“摧毁印度人的传统意识和价值观”^②。因此,帝国殖民统治文化带有强烈的扩张性和排他性,它与印度本土文化在争取印度意识形态控制权上彼此竞争;而取得独立之后的印度必然要选择扶持、重建本土文化,以达到建设民族国家的目的。这样,如何去除或抑制殖民文化中的破坏性因素,并挑选出其中代表世界发展潮流的具有建设性的现代文明因素,使之与印度本土文化在同一时空中得以共存,最终求得印度向现代文明国家的转型,就是新生的印度要着手协调的关键问题。应该说,这也是印度基于自身历史进行现代性建设的必然之举。

这个问题令人联想到罗伊的《想象的终结》^③一文,文中她猛烈抨击印度政府追随西方帝国列强进行核爆试验,搞军备竞赛,是一种“想象的终结”,而那颗成功爆炸了的核弹更是“比任何白人都白”,是“终极的殖民者”。与此同时,她对印度年轻人在涌上街头庆祝核爆成功时把可口可乐倒进下水道以示对西方文化的摒弃这种行为表示出极大的担忧。她批评道:“我们直捣白人的核心,我们拥抱西方科学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创造,并把它称为我们自己的。然而,我们反对他们的音乐、他们的食物、他们的服装、他们的影院和他们的文学。”如此,历史上被吸收进印度文化中的诸多事物,如由世界各地传播而至的“烹饪食材”、“板球、英语和民主”等,是否也应一并驱除?在罗伊的这段论述中,首先她指出印度进行核爆试验是对帝国殖民统治思维的忠实复制,并非印度现代文明建设

① 帕沙·查特吉《我们的现代性》,第82页。

② 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1页。

③ Arundhati, “The End of Imagination”, <http://www.outlookindia.com/article/the-end-of-imagination/205932>

的真正目标；其次，她表明西方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那一部分应当得到当代印度人的珍惜；再次，她所提到的“烹饪食材”以及“板球、英语和民主”等显然早已和印度本土文化产生了或深或浅的融合，有些甚至已经成为印度的国家名片。^①由此可见，罗伊清醒地认识到，在印度的现代发展进程中，异质文化势必同时存在并需要协调，使之共同造就印度的现代性。从这一角度来说，帕帕奇的蛾成了小说中代表处于对立两端的异质文化^②共存的标志性意象。

二、冰冷丑陋的蛾

帕帕奇的蛾，无疑与伊培家族在印度独立后的大环境中的命运息息相关。帕帕奇的失败既暗寓了家族的命运，更暗寓了独立后的印度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本土文化与殖民文化之间的进退失据以及印度社会高低种姓之间实质性融合的落空。因此，在帕帕奇的外孙女、阿慕的女儿瑞海尔的心中，蛾的形象始终是“冰冷”^③而“令人颤栗的”（*God*: 225）。

瑞海尔纤细敏感，对外祖父的“新亚种蛾”总是有着特殊的感应。第一次感应发生在伊培家族的长子恰克的前妻玛格丽特携女从伦敦来印度度假时。当时众人欢欣热情地到机场迎接，瑞海尔心中却感觉“充满了毛茸茸的蛾和冰冷的蝴蝶”（*God*: 146）。恰克是典型的受过系统英式教育并且出身印度高种姓富裕地主家庭的精英知识分子代表。在他与英国女性玛格丽特相识的初始，他便以“邈邈而有福的豪猪”（*God*: 241）式外表和夸张奔放的印度式表达吸引了后者的注意力；换言之，恰克以他的“异域情调”（*exoticism*）^④赢得了与玛格丽特联姻的机会。从这一点来说，无论恰克本身是否有意，他都作了一次把自身携带的印度文化与他所接触的英帝国文化相融的尝试。而且，即便是婚后不久即遭对方抛弃，他仍然不减对她的爱意。及至玛格丽特接受他的邀请，携女到阿耶门连度假，恰克更是郑重地换上西装和领带（*see God*: 142），而不是平常穿的印度芒

① 比如，板球是印度全民狂热喜爱的第一大体育项目，印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等等。

② 这里的异质文化不单指帝国殖民文化与印度本土文化，还包括印度社会内部源自传统等级文化与现代平等思想所导致的异质文化对立。

③ 综观整部小说，“蛾”这一意象发于帕帕奇，但它之后的每一次出现都与瑞海尔的心理活动紧密相连。瑞海尔对蛾的最初三感应都表达了冰冷的感觉，如“它那冰冷的腿触碰她”（*God*: 112）、“蛾在瑞海尔的心上张开它天鹅绒般的翅膀，那寒冷直爬进她的骨头”（*God*: 113）、“那只蛾在瑞海尔心上抬起一只毛茸茸的脚。然后放下。它的脚是冰冷的”（*God*: 136）。

④ Graham Huggan, *The Postcolonial Exotic: Marketing the Margins*,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xi.

杜 (see *God*: 248), 并在机场以“妻子” (*God*: 142) 而非“前妻”的称呼将她介绍给前去迎接的全家人。与在婚姻维系阶段中的状态相比, 恰克为了与拥有英帝国殖民宗主国背景的玛格丽特保持关联, 在很大程度上抹去了自己身上的印度特性, 以让玛格丽特更感舒适的英国绅士面貌出现。同时, 他对后者并不恰当的称呼更显露出想把“拥有英国妻子”这样的殖民荣耀留在自己身上的强烈渴望。因此, 恰克先是以所谓的“异域情调”向殖民宗主国献媚, 而后又以牺牲“异域情调”再次献媚。可以说, 在恰克身上, 印度本土文化在与帝国殖民文化的博弈中, 呈现出节节败退之势。因此, 生性敏感的瑞海尔感受到的是“毛茸茸的蛾”与“冰冷的蝴蝶”。蛾本是化蝶之前的一个必然生长阶段, 但恰克的自我矮化与玛格丽特的高高在上形成鲜明对照, “毛茸茸”的丑陋与“冰冷”的美丽成为截然对立的两端, 不但不具有融合的温暖, 更无法实现从蛾到蝶的自然升华。

在本土文化与殖民文化博弈中的这种进退失据, 其实在帕帕奇身上有着更鲜明的反映。正如恰克对父亲帕帕奇的评价——他是一个“亲英派” (*God*: 52), 少年时期的留学经历和多年在帝国殖民科研机构的任职经验使得帕帕奇对任何与英帝国沾边的人、事都有着近乎不假思索的崇拜; 与之相对的, 则是他对出自印度本土的事物的一面倒的蔑视与贬低。他所发现的新亚种蛾只是因为有望在西方生物分类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为他赢得属于一位“帝国生物学家”的荣耀而被他亲睐有加; “这位尊敬的科学家对他所研究的动物从未感到一种真诚的亲密关系, 更不用说热爱了”^①。在印度古典文学作品中, 读者常可见到人与动物间的亲密关系^②; 然而, 帕帕奇作为一位生物学家, 缺少对自己发现的这种新亚种蛾的真诚热爱, 只是功利性地将之作为自己获得荣誉的凭借。由此可见, 虽然他所发现的这只蛾包含两种异质文化共存的“新亚种”特性, 然而在他这个发现人身上, 显然帝国殖民文化意识形态占据了绝对优势, 而他身负的另一重身份,

① Peter Mortensen, “‘Civilization’s Fear of Nature’: Postmodernity,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in Klaus Stierstorfer, ed., *Beyond Postmodernism: Reassessments in Literature, Theory, and Cultur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3, p. 191. 莫滕森该言诚然出自西方生物学家对动物往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 但也与印度自身的传统相契合。

② 在印度古典文学作品中, 动物往往是人们寄托感情的对象和表达好恶的工具。比如, 《罗摩衍那》中, 猴军充当罗摩的战友大战魔王, 帮助他夺回妻子悉多; 《沙恭达罗》中, 沙恭达罗与净修林中诸多动物间存在近乎亲人的关系; 还有《罗怙世系》中向罗摩求爱却又令人憎恶的蛇女等等。各种动物无论充当的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角色, 都与人有情感交流。换言之, 它们与人具有人文意义上的平等地位。这就显著区别于帕帕奇对待蛾的不带感情的研究眼光和与学术声誉相连的功利态度。

即印度本土生物学家，及这一身份背后支撑着的印度本土文化则消失殆尽。正是这种失衡，注定了帕帕奇为这只蛾申请命名的失败，他也只能接受自己在抑郁寡欢中了结余生的人生悲剧。

对于帕帕奇与蛾之间的半生纠葛以及他因此给整个家庭带来的暴力和恐怖氛围，恰克本身并不是毫无反思。他明白“他们是一个亲英家庭，朝错误的方向前进，在自己的历史之外被困住了”（*God*: 52）。不过即便如此，恰克始终无意也无力纠正自身及家族的这种状况。萨义德说，“西方的意识、知识、科学控制着最遥远的东方地域以及最细微的东方要素”^①，甚而“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②。基于帝国殖民统治目的的思想意识皈化活动，使得被“东方化”了的东方人只好沿用西方的东方学家所建构的对东方充满居高临下优越感思想和话语体系来对待自身和自己的文化，不自觉地陷入对西方文明这一“他者”的一味模仿和追逐中，同时主动排斥了“自我”立足所必备的本土根基。这两种文化在伊培家族两代家长身上的失衡最终导致了对整个家族的毁灭性打击：恰克的女儿苏菲溺水身亡，瑞海儿的胞兄艾斯沙成了替罪羊，被逐出家门。艾斯沙作为伊培家族的继承人却被长辈以如此理由毁掉一生，只能表明印度“亲英”的精英富裕阶层彻底屈服于自发的压倒性殖民统治意识，进而落得自我毁灭。而恰克本人最终远走异国和伊培家族在当地的彻底衰落更明白表示出不能平衡好帝国殖民文化对印度本土文化的影响、一味追求和模仿西方现代文化的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在寻求建设现代印度的途径方面终究难以有所突破。新亚种蛾本应表明印度本土文化与殖民文化的融合，然而在帕帕奇的心中，印度本土文化的内涵仅仅只是高种姓的上层社会，而且这个“高种姓的上层社会”在殖民文化那只“冰冷的蝴蝶”面前不过是一只卑躬屈膝的“毛茸茸的蛾”。瑞海儿的这一感应隐喻了帝国殖民文化对印度本土文化所形成的绝对优势以及这一绝对优势对印度独立走向现代社会的巨大障碍。

瑞海儿第二次对蛾的特别感应发生在低种姓出身的维鲁沙与帕帕奇的女儿阿慕开始在“历史之屋”午夜幽会之后。艾斯沙像往常一样提议妹妹一同去那儿玩耍，瑞海儿却突然感到“在她的心上一只背毛异常浓密的灰褐色蛾子展开它那掠食者的翅膀”（*God*: 198）。处于社会阶层底端的贱民维鲁沙作为小说中的

①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314页。

②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418页。

“微物之神”^①，渴求人与人之间平等、自由的情感交流，为此他大胆地与伊培家族的女儿阿慕秘密相恋，彻底打破了《摩奴法论》所规定的低种姓男子不得与高种姓女子交往的禁忌。^② 1947 年取得独立后，印度就在《宪法》第三篇中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禁止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出生地的歧视，受聘机会平等，废除种姓制度”等内容^③。也就是说，独立之后的印度希望建设的是一个高低种姓之间能够相互接触、接纳甚至融合的社会，提倡的是“人人平等”的现代文明。然而，从维鲁沙后来的遭遇来看，很显然决定他命运的并不是代表国家理想的印度宪法。他的贱民身份使得他在现实生活中首先要遵循的只能是以数千年传统种姓文化为根基的“爱的律法”（Love Laws），该律法出自《摩诃婆罗多》中王后贡蒂为保护她的婚生子般度五子与自己的私生子迦尔纳所作的罢战约定。罗伊在小说中多次提到这条律法对印度社会的禁锢。这条“规定谁应该被爱，如何被爱以及得到多少爱”（*God*: 33）的律法决定了维鲁沙只能活在社会习俗所划定的活动空间，决不可逾越，而他最终也以劫持伊培家的孩子这一莫须有的罪名遭警察殴打致死。在决定维鲁沙命运这件事情上，种姓至上的“爱的律法”在印度社会中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以至于国家机器和高种姓的上层社会要竭力调动手中现代文明所赋予他们的权力，来维护印度传统社会中的种姓等级文化。正如尚会鹏教授所言：在印度，“种姓、阶级和权力大体一致的传统模式目前仍未从根本上发生变化”^④。甚至，为了彻底掩盖维鲁沙与阿慕的这段“不法”恋情，伊培家族不惜将阿慕与艾斯沙母子逐出家门，导致阿慕病死在外，艾斯沙无家可归。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规定“人人平等”的印度现代社会，禁止融合的传统种姓文化仍然在民众的思想意识领域占有统治地位。接受了平等新思想的少数人与坚持传统等级思想的大多数人之间的激烈交锋，使得原本具有异质共存特性的“新亚种蛾”长出了一对“掠食者的翅膀”。既为“掠食者”，那么它要求种姓制度的触犯者付出的必然是生命的代价，瑞海尔敏锐的感应力使她预感到与母亲阿慕幽会的维鲁沙的命运结局。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帕帕奇为何对新亚种蛾缺乏本土关怀与热爱，因为他关注的只是印度高种姓的上层社会与殖民文化之间的融合，而不涉及印度社会自身高低种姓之间的融合。罗伊对印度社会

① 小说中两次把维鲁沙直接称为“微物之神”，分别出自第 220 和 330 页。

② 详见《摩奴法论》，蒋忠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42 页。

③ 详见 <http://lawmin.nic.in/olwing/coi/coi-english/coi-indexenglish.htm>

④ 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41 页。

现状也作如此判断：“这个分层级且水平分离的社会……没有通婚，没有社会融合，也没有人际——人道——互动以团结各阶层。所以，当社会的那底层半部分被切断并消失时，它发生得悄无声息。”^① 帕帕奇的新亚种蛾本应是印度独立后异质文化共融的一个特殊标志，然而在帝国殖民统治文化和传统种姓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在瑞海尔的感应中，蛾的形象变得既丑陋卑微又狰狞恐怖，“新亚种蛾”所象征的以印度现代文明为目标的融合也难以实现。

三、蛾的消失

23年后，瑞海尔重返阿耶门连，她看到帕帕奇书房里挂着的“蝴蝶和蛾的标本已经化成了一堆堆红色粉末，洒落在它们的玻璃展示盒底部……整个房间因为发霉和闲置而充满了臭味”（*God*: 155）。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蛾的粉末化，它曾经给瑞海尔带来的巨大恐怖感也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瑞海尔在同一个书架上找到的童年时藏在书册后的几件玩具。成年之后的瑞海尔能够坦然面对这只新亚种蛾的标本粉末而不再感到恐惧，表明她已经有能力为异质文化的共融找到一个突破口。回到阿耶门连后，她沉默以对邻居朋友崇洋媚外的炫耀，对自己为同胞所羡慕的在美生活更是淡然。并非巧合的是，艾斯沙也保持了沉默。艾斯沙的沉默源于他从童年起遭受的流放。艾斯沙当年被逐出家门一是作为伊培家族继承人为苏菲之死向玛格丽特赔罪，这等同于印度“亲英”精英阶层以自己的未来向强大的帝国殖民统治意识形态献祭；二是为了掩盖高种姓家庭的女儿居然与贱民私通的丑闻。由此，艾斯沙背负了伤害殖民者与跨越传统禁忌的双重原罪。

学者阿兰在论述印度现代性问题时提出的“印度人应首先享有退出的权利”^②，或许可以解释这对双生子的沉默：“在印度，社群维持他们生活方式的办法是依靠否认个人有权不一样……前现代道德规范的一个问题与它们的实施模式有关。这些规范总是强加于人，而不像现代道德那样只能提倡……在程序上，应该首选现代道德的实施模式。使退出的权利不可讨价还价，也许能使社群经过一段时间后向那些被提倡的道德规范变化。”^③ 在这段话中，阿兰提出的核心观点是，现代文明与前现代文明的重要区别就在于社会规范是以提倡还是强制的方式

① N. Ram, "Scimitars in the Sun", in *The Shape of the Beast: Conversations with Arundhati Roy*, p. 6.

② Javeed Alam, *India: Living with Modernity*,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17.

③ Javeed Alam, *India: Living with Modernity*, p. 217.

得以实施，而享有“退出的权利”是个人对抗社群威权的有效办法。显然，瑞海尔与艾斯沙的沉默即是这种“退出的权利”的表达，这样仍然弥漫在空气中的对西方现代文明不加选择的崇拜和迷恋以及对传统种姓制度隐晦的遵从都已不再对他们构成影响，甚至瑞海尔还可以重拾珍藏的玩具，与艾斯沙重温童年，并以此抚慰艾斯沙所遭受的心灵创伤。

因此，新亚种蛾最终展现出的只是帕帕奇的有缺陷的或畸形的融合期待，即印度上层社会与殖民异质文化的融合；而新亚种蛾的消失则寄托了作者罗伊对印度现代性的建设性思考，即现代印度不能仅仅只是社会上层与殖民异质文化的融合，而更应是印度社会高低种姓之间的融合。高低种姓间的实质性融合才是印度现代性的根本，因为它所代表的是全体印度的未来。因此，总以悚人面目出现的新亚种蛾虽然消逝了，但代表着自由想象的童年玩具在这间臭气熏天的房间里却保存完好，显示了作者对于自己严厉批判的这个分离的社会仍然有所期待。正如学者鲁道夫夫妇在评述印度的现代性建设状况时所提到的：“在同胞感情（fellow feeling）成为一种可被广泛感知的现实之前，政治民主、道德平等和普遍公民权是建立在官方思想意识和宪法的组织安排中的。”^①也就是说，它们还不可能成为人们普遍的自觉选择，那么，罗伊笔下的瑞海尔与艾斯沙的互动正是对创建这种“同胞感情”的呼应。事实上，它最终所指向的也是“新亚种蛾”在罗伊眼中本应象征的社会融合。

这部小说始于瑞海尔与艾斯沙在家乡的重逢。作者充满寓意地写道：“艾斯沙和瑞海尔认为，他们在一起是我，分开个人则是我们。好似他们是罕见的双胞胎，身体分离，灵魂相连。”（*God*: 2）放弃了美国婚姻的瑞海尔为了探望背负母亲与贱民私通原罪而遭流放以致“不可接触”的艾斯沙而返回阿耶门连，这一举动代表着印度社会最接近殖民宗主国帝国的高种姓那一端与最靠近底层“不可接触”的低种姓群体那一方的重新相会；而他们的“本性相连”则点出了对于印度社会整体而言，他们都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未来印度共同利益的制造者和分享者。及至小说最后，作者又重温艾斯沙与瑞海尔的回归给伊培家族这个阿耶门连的百年望族重新带来的生机，这种生机正是基于高低种姓间的融合这一根本：“她〔瑞海尔〕移动她的嘴。他们美丽母亲的嘴。挺直坐着，仿佛等着被逮捕的艾斯沙将他的手指伸向那张嘴……他〔艾斯沙〕的手指循着它的形状，然后触摸牙齿，然后，他的手被握住了，被亲吻了。”（*God*: 327）这里，

^① Lloyd I. Rudolph and Susanne Hoeber Rudolph, *The Modernity of Traditi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Ind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 104.

瑞海尔和阿慕、艾斯沙与维鲁沙在形象上的重叠，使得两代人的情感遭遇也得以发生共振。瑞海尔对艾斯沙的抚慰，同时也是给予维鲁沙的抚慰，是对他们所遭遇的种姓迫害的正视和纠正，也隐喻了高低种姓间的融合在伊培家族中的继续。而在小说结尾，作者又把笔墨聚于恰克前妻玛格丽特带女儿来印度度假的那一天，“他〔维鲁沙〕以手捧起她〔阿慕〕的脸，将它拉近他的脸。他闭起眼睛，闻她的皮肤”（*God*: 340）。与此相映衬的是恰克对玛格丽特的爱：“‘是的，玛格丽特，’她〔阿慕〕想，‘我们也那样做了。’”（*God*: 340）这说明恰克与玛格丽特曾互相捧着脸亲吻，彼此闻着对方的气味。由此可见，高低种姓之间、本土文化与殖民文化之间，两份爱情的重叠与融合才是罗伊心中真正的“新亚种蛾”。

赵一凡先生在阐释现代性时总结道，“从一开始现代性本质就是变革，以及由此而来的利弊交杂、福祸相依、风险与希望同在”^①。综观罗伊在这部小说之后出版的诸多文集可知，她对于如何在变革中寻找印度现代文明的发展之路是极为关注的。尤其面对殖民和种姓这两大印度社会的焦点问题该如何寻求一种新的理解视角，始终是她思考的方向：“我们今天所需的……是长远的眼光……我们无法完全活在当下与我们无力远眺未来有关，而这使得我们成了奇怪的夹缝生物……”^②在《微物之神》中，为这只新亚种蛾代言的瑞海尔以其自由与探索精神，表达了罗伊所一贯追求的“一种理解……一个探索的过程……也是一个推动我自己更长远和深入地看待我所生活着的这个社会的方式”^③。罗伊对这个社会的不断“探索”极大触动了印度人民对自己现实生活的看法，使他们不因“无力看到这个世界既定模式之外的样子”^④而困于绝望之中，失去力量。

[作者简介] 黄怡婷，女，1984年生，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室助理研究员，目前主要从事印度英语文学、梵语古典文学研究。近期发表的论文有《“微物”的“神”性——论阿兰达蒂·罗伊视野中的贱民形象》（载《东方论坛》2014年第5期）等。

责任编辑：严蓓雯

① 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650页。

② Arundhati Roy, “Introduction: Democracy’s Failing Light”, in *Listening to Grasshoppers*, Penguin Books, 2009, p. x.

③ David Barsamian, “Development Nationalism”, in *The Shape of the Beast: Conversations with Arundhati Roy*, p. 74.

④ Arundhati Roy, “Come September”, in Arundhati Roy, *The Ordinary Person’s Guide to Empire*, London: Harper Perennial, 2004, p. 17.